

学位点是否合格要看“产品”

□ 眉间尺

近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了2016年学位点动态调整结果,共有576个学位点被撤销,涉及25个省份的175所高校,其中包括大量博士学位授权点。从舆论反应看,人们对这次学位点“瘦身”普遍持肯定态度。

目前,学位点建设和评估普遍重视专家的意见。按有关规定,专家组一般是由本学科领域学术水平较高的研究生导师。专家具有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经验,当然应在评估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过,同时也应考虑,学位点不同于科研站,它虽然也承担科研任务,但最根本的任务是培养人。衡量一个学位点是否合格,固然是把引进了多少著名学者,发表了多少论文,举办了多

少学术活动等作为重要指标,但更根本的则是为国家培养了多少合格的人才。而师资队伍、学术活动和学术成果,只构成人才培养的条件或旁证,并不能直接等同为人才培养的成绩。

全面、客观、公正的了解学位点的人才培养状况,还需要直接倾听被培养者的意见,包括在学的学生和毕业的校友。因此,学位点的日常建设和评估中,除了目标定位、研究方向、师资队伍、科学研究、学术交流、资源配置、制度建设等方面的考察外,还应注重人才培养质量的实况追踪。在学学生对学位点教学等方面的感受和意见建议,以及毕业校友择业和从业的经历和体

会,是对学位点人才培养状况的直接检验。实际上,不少发达国家都已把校友与公众听证会纳入学位点评估的程序之中,这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从操作性来看,现在,很多高校都重视校友会、系友会的建设,特别是一些历史悠久的名校、大校,往往设有专门的机构和工作人员负责对校友、系友成长状况开展动态汇集,长期以来已经积累了宝贵的校友“大数据”。如果以学位点为单位,按照人才培养的指标体系,对此类数据作出社会学意义的分析,其结论一定会成为某个学位点是否应继续存在或如何改进提高的最直观的佐证。而在学位点日常建设中,把

建立与各领域校友的沟通机制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制度化、经常性地听听校友们的意见,无疑也有助于及时校正学位点的发展方向 and 教学重点。

学位点动态调整,对我国高等教育整体发展具有导航仪的意义。在现有的评估体系基础上,充实完善学生发展跟踪调查数据体系,抓住学位点人才培养实绩这个牛鼻子,进而带动教学资源重组、科研人才流动,师资队伍重塑,课程体系改革等一系列举措,才能进一步带动高校学科布局乃至高等教育结构的优化,提升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能力和水平,为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莫视网约车如猛虎

□ 陈雍君

最近“网约导游”成为新鲜热词,不少媒体平台纷纷讨论网约导游是否能破解旅游市场矛盾,并事先预测网约导游可能带来的种种可怕弊端,呼吁产业各方尽早理顺关系加强管控云云。联想到前段时间各大城市出台“史上最严”网约车管理规定,大城市和行业管理者们对“网约模式”已视之若猛兽。然而笔者认为大可不必如此,网约模式作为新兴互联网经济形态仍待发展,虽存在不少问题,但更需宽容态度和一定自由空间。

网约模式是“互联网+”的生动实践,不仅使传统行业供求双方取得效率和效益的更佳匹配,也充分调动了社会闲置资源以共享的方式投入到市场中来。我们必须注意到,目前中国服务类消费需求持续旺盛,而无论质量还是数量均供给能力不足,这是网约模式得以落地实施的根本原因。今天火热的网约车、网约导游、共享单车、网约家政、网约外卖等,都是信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

诚然,网约模式在高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比如网约车曾发生令人扼腕叹息的刑事案件,曾曝出注册司机良莠不齐,最近又出现以租代售等金融和劳务风险。虽然问题不少,但绝不能因此类极端事件,就抹杀网约模式本该起的作用和普遍贡献。比如网约车的确方便了市民出行,的确盘活了一批闲置资源,甚至的确养活了一批勤奋的劳动者。作为一个新兴模式,发现问题就解决问题,哪里不足就规范哪里,这才是助其发展的正确方式。大家不妨回顾一下,现在被大家认可的出租车行业,当初不也经历了高速发展、监管缺失、甚至极端刑事案件吗?

最近还有研究者提出,网约车“背离了分享经济内涵”。原因是分享经济的内涵指的是司机将多余的“空位”与他人分享,而中国的网约车居然出现了职业化的网约车司机,形成了非正规就业方式,因此已背离了分享经济内涵。

应该看出,最近各地出台的网约车新政,正是将网约车尽量“打回”到上述分享经济内涵的范畴中去。然而,无论网约车平台的初衷是否只是为了打造符合所谓分享经济内涵的模式,那么在其发展过程中,如果又解决了部分人群的就业问题,能够帮助他们养家糊口,哪怕是“非正规就业”,这难道不是这个平台的意外之喜、应有之义?不该多多益善吗?至于其中牵涉的劳动保障等政策和法律问题,如果网约车平台实在解决不了,这不正是该主管部门顺应经济发展形势,创新工作模式,研究调整政策以匹配生产力发展的分内工作吗?

网约模式的问题多,矛盾多,对城市管理和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也多,但网约模式是面向未来、匹配信息社会发展步伐的新型经济模式,需要以更加积极的心态面对,总体来讲既要以法律的准绳严格律之,也要给其空间,并加强对其服务和引导。反过来,倘若视其为猛虎,为了符合共享经济的内涵就对其勒紧缰绳,那真是现代信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画地为牢了。

被告江南认错道歉也算担当

□ 填下乌贼

金庸先生状告江南《此间的少年》侵权并索赔一事,让我想起了十多年前初次读这部小说的时光——这部借金庸小说人物关系及性格特点,描述大学校园中欢乐与惆怅的种种故事,在当时风靡一时,更赢得了许多像我一样的金庸迷的认可和赞许。毫无疑问,《此间的少年》是金庸网路同人文的开山鼻祖。

当然,江南先生的做法的确有不妥当之处。按《著作权法》的规定,具体到此事应涉及改编权及保护作品完整权。但是,读过《此间的少年》一书的人都知道,作者江南仅用了金庸作品中的部分人物设定,故事情节完全原创,与金庸原著毫无关系。如果说是改编权被侵犯或者破坏原著的完整性,似乎有些冤枉了。

但是,金庸作品之所以在华人世界多年

畅销不衰,除了对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和“情义”“家国”的阐述,更创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提起郭靖、黄蓉、杨过、令狐冲、韦小宝来,在华人世界谁人不知?如果《此间的少年》中的人物换成其他姓名,这部小说恐怕要大打折扣,不足以打动人心。

无论怎样,借用别人的原创角色进行二次创作,并且出版和影视化,获得商业利益,这的确确是侵权了,金庸先生依法维权,于法于情于理,完全站得住脚。江南理应停止此作品的传播并依照法律进行赔偿。

然而我以为,此事并不影响江南先生的才华和品格。

江南先生10月23日对此事的回应中写道:“鉴于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我已委托律师处理,不便就法律问题做回应,相信法院会公正审理……无论法律层面的结果如

何,我都非常非常地抱歉于我22岁那年的孟浪和唐突,因此这些事情给金庸先生造成的困扰令我非常地自责。”

这几乎是我近年来看过的关于回应抄袭侵权的文章中最诚恳的一篇了。有错承担,不卑不亢,江南坦诚承认了自己的过失,并表达了对金庸先生的尊敬。老老实实的认错道歉并依法赔偿,既没有像某几位先生一样百般托词抵死不认,也没有摆出一副“傻白甜”的姿态,这是江南对金庸先生的尊重,也是他对自己作品的尊重,更是对所有喜欢他们的读者的尊重。

读过《此间的少年》的读者,都会认可江南这位北大才子的文字功底,而后他创作了《龙族》《九州缥缈录》等作品,并一手创办了《九州幻想》杂志,收获了大量读者,粉丝的同时更是屡屡登上作家富豪榜排行榜。江

南先生的才华早已得到了证明,以诚恳的态度和妥善方式处理好“年轻时的错误”不仅不会影响公众形象,反而会更加加分。

此案之所以引人关注,并不只是因为金庸及江南的名气,而是它牵涉到广大著作权法的引申使用。同人作品如何重新定义解构和戏仿?如何重新规划同人文的创作边界?这是将来的写作注意点。金庸状告江南有可能成为我国网络文学界、出版界及著作权领域中的标志性事件,给许多作者及读者带来新的认识。

最后,我大胆猜测一下,此事最终很有可能法庭和解收场,长者大度,少年明理,这是很好的结局,也是最符合大众期盼的结局。

竟然有一种《雪山飞狐》结尾那一刀砍还是不砍的感觉。

大型对撞机动议应诉诸科学的态度

□ 段伟文

(接10月21日6版《科技话题》)

——要从BEPC的240米一跃而跳到100公里,当以戒慎恐惧、临渊履冰的态度,通过认真的国际合作才可能健康发展。否则很容易让国际同行和公众形成的一个印象是,中国貌似会一个人抱着球跑。

其次,看看估价。根据王贻芳研究员9月5日回应杨振宁的文章,100公里的CEPC和SPPC的造价分别达400亿元和1000亿元,中国分别需要出资300亿和700亿。但据报道,王贻芳研究员今年6月2日在中科院学部报告会上表示,CEPC50公里造价约255亿元,100公里造价约360亿元。且不说此前还有其他估价,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100公里CEPC的造价一下子涨了40亿元,这要么说明其预算方法不够严密,要么说明现在要做出准确预算其实很困难。当然,细心的读者也会发现,2014年王贻芳研究员发表在《现代物理知识》上的一篇文章中还是比较谨慎地指出,造价尚在评估之中。她且接受这些最新的数据,反观CEPC和SPPC的竞争对手FCC及ILC,不难发现两个问题。其一是项目规划和预算的严肃性。既然规划有所变化且通过国内外媒体呈现出来了,就应该实时更新其官方版本,同时还应该考虑其造价接受同行和第三方的严格审议。其二需要对其国际经费支持以及国际合作的方式有所交代。对比CERN中主要资助国德、法、英等分担的比例大约为20%、15%和13%的情况,是否应对中国70%和国际30%的投入的依据与可行性作出说明?对此带来的国际合作的性质以及过高的风险承担是否也应有所交代?此外,

在CEPC和SPPC的经费论证中,以年度投入占GDP的比例来自证,这种过于简单的算术实在不够严谨,更远远未体现出专攻高精尖演算的粒子物理学的特长。显然,在这种为了争取多切些蛋糕的比较中,如果不能证明自身的权重,就先应该与其他学科进行对比,否则又会出田忌赛马的套路,而迫使决策者求助于“重整化”来解套。

不得不说的是,以中国高能物理现有的科研实力,要从BEPC的240米一跃而跳到100公里,当以戒慎恐惧、临渊履冰的态度,通过认真的国际合作才可能健康发展。值得深思的是,在大型对撞机上投入比例过高,非但不能给国家带来相应的荣誉和科技地位的回报,反而会因为达不到应有的目标使国家形象受损。而且,过高的投入比例很容易让国际同行和公众形成的一个印象是,中国貌似会一个人抱着球跑,搞不好还会套牢政府,独自抱着球跑完CEPC和SPPC上、下两个半场!

这种情况是应该警惕的。德国慕尼黑大学的Otmar Biebel教授不无尖锐地指出,如果中国准备将大型对撞机变成一个个纯粹的“国家项目”,他会持反对意见。再反观日本政府将争取国际经费的谈判与他国投入的承诺作为立项的先决条件的做法,绝不应鄙夷地斥之为没实力、观望或矫情。动议者与相关部门应该认真思考和分析这些外部的建议和做法的合理性,不仅要考虑适当提高国际经费的比例,还应该上升到体制机制层面,系统深入地探讨既符合国际惯例又合乎本土情况国际经费分担框架及治理模式,以此保障和激励科学目标与国家目标、中国科学与全球科学通过共担共创实现共享共赢。

话说回来,不论是国际合作还是竞争,都没那么简单!不无吊诡的是,今年8月《自然杂志》一篇评论文章将中国会不会建造下一代对撞机与LHC重启后是否找到有意义的发现并列高能物理的不确定性因素。其基调是:从营造有利于经费游说的国际大环境来看,中国提出对撞机计划应该受到欢迎;同时,中国的高能物理界共同体较小,中国的对撞机应该通过国际合作的模式建造;但是中国的方案挤压日本的ILC等的国际经费和研究资源,甚至会产生负面影响。东方的智慧告诉我们,褒贬是买主,喝彩是闲人。那些仰望星空的理论物理大牛为何喝彩?那是因为他们对实验中没有特殊的利益,只要是实验上的投入他们都会欢迎。而那些竞争者和利益相关者的褒贬,则应认真琢磨其真实意图与其话外之音。而由此进行的冷静思考恰是中国真正转身成为全球性国际科学竞合游戏的主导者的起点,将使我们对国际科学共同体在对撞机建设上的“合群”态势的复杂性有更理性和深刻的认识。此外,或许还存在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CEPC与SPPC在与同类项目的竞争中相继胜出而成为唯一的国际合作项目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

——“新物理迹象”是指LHC上的新发现,而CEPC与ILC是对其进行精细测量的第二道工序。如果前面路向不明,第一步都未必应该跨出去,何谈为第二步赢得技术准备?好比还没相识,怎么可能跨过相知相爱就直接结婚?

最后,说说技术路线。按照王贻芳研究员的回应,大概的技术路线分为两步:第一步,2022—2030年

建造CEPC,对撞能量0.24—0.35TeV,建成时是世界上最大的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如果“CEPC有新物理迹象,且高场磁铁所需新型超导材料技术成熟”,就关闭CEPC,进入第二步,2040—2050年建成SPPC,对撞能量100 TeV。高能所一位专家年初撰文指出两步走有四大好处:保证有大科学产出,相对容易、相对便宜和为第二步赢得技术准备的时间。但问题是,CEPC的对撞能量只有0.24—0.35TeV,而2000年关闭的LEP的能量已达0.21TeV。反观其竞争者ILC的能量至少可达0.5TeV。而ILC的设计者指出,环形对撞机因正负电子存在能量损失而令其造价于对撞能量的平方成正比,而直线对撞机的造价与对撞能量成正比,使其达到万亿能标所需的费用比环形对撞机便宜得多。故一旦LHC及其改进版上呈现出有意义的现象,ILC不仅有能量优势,而且更容易以较低的成本改造升级。

从未来实际发展来看,CEPC的“相对容易”与“相对便宜”能否成为其竞争优势是有条件的。如果到2018年LHC没有新发现,下一代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基本任务是精确测量希格斯粒子的性质,不需要那么大的能量,ILC很可能搁浅,而CEPC被国际粒子物理界接受的可能性加大,但此时包括SPPC在内的下一代质子对撞机的建造需求大打折扣。如果2018年LHC有新发现,ILC虽然较难较贵,国际粒子物理界选择建ILC可能性更大,后续可能会继续乃至根据需加快建FCC,此时CEPC的竞争优势不大。故可能的路线图是:第一种情况CEPC可能启动并可能获国际支持,但SPPC有无必要开启是未知数;第二种情况即便ILC启动依然建CEPC,国际支持会不足,后续

SPPC也会因此难度加大。

再看“大科学产出”。如果类似去年“双光子粒子”的“消失”使超过500篇论文被“消除”的情况一再发生,“大科学产出”的品质何以保证?而这进一步提醒我们,所谓“CEPC有新物理迹象”的前提是LHC及其改进版上可以观察到有价值的现象,而实际上“新物理迹象”是指LHC上的新发现,而CEPC与ILC是对其进行精细测量的第二道工序。如果能正视这一不确定性因素的关键作用,就不难理解ILC甚至FCC为何磨磨唧唧又不约而同地等到2018年进行审议或完成概念设计。如果前面路向不明,第一步都未必应该跨出去,何谈为第二步赢得技术准备?好比还没相识,怎么可能跨过相知相爱就直接结婚?

科学在于细节,人必须学会直面细节中的魔鬼!面对大家已有共识的不确定性,似乎不宜仅从科学发展需要建更高能量的对撞机这一笼统的原则出发,一味强调“需要造,应该造,马上造”。换言之,如果2018年LHC确实找不到有意义的发现,我们应该像日本那样不见兔子不撒鹰还是精工填海般勇往直前?反过来,2018年如果产生了有价值的发现,LHC或VLHC等就不会及时调整战略,直扑超对称物理的“寒武纪大爆发”吗?面对对撞机设计蓝图所描绘出的引领未来的美好图景,不宜轻易地接受乃至陶醉于一厢情愿的“在国际竞争中抢得先机”的胜算;而应清醒地意识到,正因为这些高深、复杂和宏大的动议是以科学的名义,更要秉持前辈科学家茅以升等倡导的“严格、严谨、严肃”的科学态度,对其加以深入细致的检视。唯其如此,方可使耗资不菲的科学动议在可以有的质疑声中修正、纠错、提升,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

■ 聚焦

梦想是一颗种子,它在不经意间深埋心田,随着时光流逝生根发芽。在梦想成长的过程中,只有精心呵护,以心血和汗水浇灌才能开出最美丽的花朵,收获最甜蜜的成果。

对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微电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常晶晶来说,有机材料在应用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特殊的光、电、热、磁等现象,对他产生的吸引力就是那颗梦想的种子,让他在追梦的道路上执着向前、展翅高飞。

入选“千人计划”青年才俊展宏图

28岁的常晶晶是中组部2016年第十二批“青年千人计划”其中最年轻的一位。这位朝气蓬勃的教授2010年6月在四川大学攻读理学博士学位,2014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毕业后,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15年底通过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华山区菁英人才”计划加入微电子学院。

1988年出生的常晶晶谈起他的兴趣和梦想,眼神中有着掩饰不住的活力与光彩。常晶晶说,近年来他主要从事有机晶体管及相关电子器件的研究,柔性印刷器件工艺的优化,有机及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研究工作等。他从最简单的有机晶体管开始,先在材料、

器件、工艺等方面对有机晶体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还探索了有机电子操作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些特殊的性质,如有机自旋晶体管、有机晶体管传感器等等。后来他又涉及到有机及钙钛矿太阳能电池领域,并希望基于此实现自供电有机电子器件。

探索有机晶体管 注重学科交叉

对科研工作的热爱是常晶晶勇于探索、不断攀登的永动机。截至目前,他先后在国际核心期刊上发表SCI论文50余篇,他引400余次,总影响因子达300以上,其中一作及通讯20余篇,二作20余篇,JCR一区论文45篇,部分研究成果被Materials Views China, Syn-facts等网站作为研究亮点进行报道,多篇文章入选年度热点文章,另有一篇ESI高被引文章。

有机晶体管的研究是常晶晶的事业和梦想,它

在常晶晶的世界里无所不在。常晶晶从材料、器件及工艺各个方面对有机晶体管进行深入研究,同时发展有机/无机混合体系电子器件,最终希望实现瞬态可降解电子器件,柔性拉伸可穿戴设备,以及结合光电器件来实现不需借助外接电源的自供电电子器件。

常晶晶非常注重交叉学科及特色学科的发展,他在有机晶体管及印刷电子器件、金属氧化物晶体管、有机及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他先后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千人计划项目、陕西省科协托举人才计划项目等,并参与了新加坡科技局科学与工程研究理事会(SERC Grant)、新加坡教育部(Ministry of Education grant)、新加坡材料工程研究所(IMRE)等共十多个项目。

文·张袞曷

着迷电子器件世界 表现卓越精湛

在电子器件的科研成果方面,常晶晶表现突出。在柔性印刷电子器件方面,常晶晶和团队在印刷电子项目“印刷技术、工艺、材料系统开发”及“可打印的高性能半导体材料在OPV和OTFT的应用”上攻关。针对当时国际上热门的印刷电子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基于完全柔性印刷技术,结合狭缝型挤压式涂布方式生长的有机半导体,有机晶体管实现了 $1.0\text{cm}^2\text{V}^{-1}\text{s}^{-1}$ 以上的空穴迁移率,实现了简单化的印刷产品。这在当时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基本满足产业化的需求,基于此工作获得了一项授权的美国发明专利。

在有机电子器件及有机/无机混合型电子方面,常晶晶和团队成员研究了分子结构、分子能级及薄膜制备等各个因素对于晶体管器件性能和稳定性的影响,

并提出了逐步氟基化等策略来制备N-型半导体,得出了同时满足材料稳定性和器件稳定性需满足的电子亲和能区范围,并利用氧化物等N-型材料来取代N-型有机材料,从而实现了有机/无机混合CMOS器件。为有机电子器件及有机/无机混合型电子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回到祖国刚满一年的常晶晶,对于未来有着无限的憧憬。他神采奕奕地说,希望以后能够结合无机及有机混合体系,实现稳定的功能型电子器件(瞬态可降解、智能可穿戴)及自供电电子器件。他说,在中科院郝跃院士的带领下,期待他们团队能够尽快实现这些电子器件的制备及应用,提高我国在该领域的国际地位,向世界展现中国的科研实力。

